

革命與戰爭：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的發展與轉折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系

摘要：在本文，我們嘗試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軸線來對“革命”與“戰爭”之間的理論意義進行討論。首先，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戰爭”的討論來出發，我們將會發現到，在兩人的討論中尚未形成一個以戰爭為出發點的理論觀點，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分析仍舊構成兩人對當時國際革命情勢的理解基礎。然而，二〇世紀初，列寧卻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經驗的總結中，為馬克思主義對於戰爭的理論思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立基點。他一方面主張以民族自決來促成全世界無產階級國家的創建與聯結，這也構成了未來冷戰秩序的國際政治基礎，在另一方面以無產階級政黨來取得國家的形式，亦即，以黨來取得對於國家武力的掌握，這點可以說是列寧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國家理論的詮釋關鍵，同時，這也是列寧的國家理論與其它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最後，我們從第三世界革命與游擊戰的討論中，來更進一步地呈現出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的圖像。現代的游擊戰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中獲得了最為驚人的效果，並且，革命的游擊鬥士也顛覆了傳統歐洲民族國家總體戰的運作框架。我們認為，相較於事先擬定的階級鬥爭的理論規劃，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這條軸線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對當代政治發展的具體影響，並且，更深刻地理解到戰爭與革命的交互作用以及革命戰爭在共產主義戰略中的價值意義。



一 前言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分析中，基本上，強調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來達成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而從階級的角度來思考國家權力時也意含著以更廣泛的社會與經濟權力關係來理解國家的運作，這樣的理論構想也形成了馬克思主義重要的實踐基礎。不過，如果以“戰爭”來作為理論思考的切入點，那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國家（主義）的思考就會遭遇理論與實踐上的障礙。當代民族主義的重要研究者（同時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意識到了這樣的難題，他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的核心關懷之一，就是針對上述的問題進行思考。他在該書的一開頭就指出了冷戰時期在中南半島上共產主義之間的軍事衝突，亦即，從越南、柬埔寨與中國之間的戰爭來思索其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運動史上的衝擊。安德森指出越南在1978年12月以及1979年1月對柬埔寨的入侵與佔領，代表第一次由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權向另一個革命馬克思政權所發動的大規模傳統戰爭，其後，中國在1979年2月攻擊越南則迅速確認了這個先例。他指出：“這幾場戰爭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僅因為它們是在幾個無可置疑的獨立革命政權之間最早發生的戰爭，同時也因為交戰各國中沒有任何一方嘗試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辯護這些屠戮。”¹ 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都不是用共產主義而是用民族國家（主義）來進行自我界定。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在戰爭的條件下，「民族國家的利益」超越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革命使命？這是否就是證明了國家層級的利益思考是無法完全以階級利益或階級鬥爭來加以說明呢？馬克思主義者要如何去面對戰爭的問題？



在本文中，我們嘗試沿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發展軸線來進行討論。首先，從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edrich Engles）對“戰爭”的討論來出發，我們將會發現到，在兩人的討論中尚未形成一個以戰爭為出發點的理論觀點，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分析仍舊構成兩人對當時國際革命情勢的理解基礎。不過，值得我們注意地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已經意識到歐洲民族國家體系中的權力關係向全球擴張的問題，一種對全球（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間）不平等的關注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成形。其次，我們試圖去釐清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國家理論的思考貢獻，其中最主要的兩條分析軸線就是，“帝國主義與民族自決”以及“無產階級專政與國家的消亡”。列寧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經驗的總結中，主張以“民族自決”和“無產階級專政”來作為最重要的國內和國際革命的手段。也就是一方面以民族自決來促成全世界無產階級國家的創建與聯結，這也構成了未來冷戰秩序的國際政治基礎；在另一方面以無產階級政黨來取得國家的形式，亦即，以黨來取得對於國家武力的掌握，這點可以說是列寧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國家理論的詮釋核心。而就我們的主題而言，列寧可以說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戰爭的思考提供了一個立基點，同時，這也是列寧的國家理論與其它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最後，我們認為，不是發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第三世界革命與游擊戰具體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爭理論。我們是透過從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經列寧到毛澤東這條理論發展軸線來加以整理分析（此處特別參照德國法學者史密特（Carl Schmitt）的游擊隊理論作為基礎）。現代的游擊戰（非正規戰）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中獲得了最為驚人的效果，並且，革命的游擊鬥士也顛覆了傳統歐洲民族國家總體戰（正規戰）的運作框架，而對游擊戰的思考也會將歐洲民族國家體系中戰爭的議題進一步延燒



到第三世界的歷史命運之中。此外，透過這樣的討論，我們也會發現到從游擊戰中所彰顯出的一種以“絕對敵對性”為基礎的“戰爭”概念。我們認為，相較於事先擬定的階級鬥爭的理論規劃，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這條軸線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在當代的實際發展方向，並且，更深刻地理解到戰爭與革命的交互作用以及革命戰爭在共產主義戰略中的價值意義。

二 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的發軔：馬克思與恩格斯

整體而言，儘管馬克思與恩格斯有著大量對於當時國際局勢和戰爭的分析，但是，他們並沒有將其形成完整的戰爭理論。在1848年到1849年歐陸革命失敗之後，馬克思與恩格斯展開了流亡的生活，馬克思在1851年到1861年期間擔任了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ey Tribune)的倫敦通訊員，撰稿的收入成為馬克思重要的生活支柱，其撰稿的內容涉及了大量的時勢分析。²

“他平均每年寫37篇文章，超過一半的文章討論的是各國外交事務，涉及的除歐洲各國之外，兼及俄國、土耳其、近東、克里米亞戰爭、印度和中國。全部300多篇文章中影三分之一涉及英國內政、外交和經濟。大約50篇討論經濟話題包括國際貿易和金融情況。”³ 其中有一部分文章是由恩格斯代筆或共同發表，此外，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也在1857年之後，為《美國新百科全書》(The New American Cyclopedia)編寫條目，其中大部分的條目都是恩格斯所寫的，大多是涉及到軍事問題，例如：「軍隊」、「步兵」、「騎兵」、「砲兵」、「築城」、「海軍」等等。⁴

從作品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有關於戰爭和軍事的討論主要就是集中在這一個時期（1850年代）。對他而言，革命失敗後的



十年是一個「難忘的十年時代」（馬克思語）。因為，世界市場的擴大使得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場蓬勃的發展，經濟上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政治意義，那些在革命時期倒下的舊王朝紛紛復辟，法國則產生了拿破崙三世（波拿巴）的第二帝國，反革命的政治勢力橫行歐洲。一直要到1857年發生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第一次的世界經濟危機，⁵這使得馬克思十分振奮，認為經濟危機將會帶來新的革命條件，他開始努力著手資料的收集和相關經濟學巨著的整理（例如：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的著作），而在1857到1858年之間完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最原始的稿件，這樣的工作後來一直持續到1860與1870年代《資本論》一書的寫作（1867年第一卷出版）。所以，為了提供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礎，需要去建立一套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作規律的嚴謹理論，這也就成為了馬克思學術關懷的重心。相較而言，恩格斯就長期地關注於軍事問題，並且作出非常多具體的戰役分析。從個人生涯來看，恩格斯曾於1841年到1842年在柏林的砲兵旅服兵役，並且在1849年時還到巴登參加過實際的戰鬥。在1851年6月19日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他就提到希望能仔細研讀軍事、研究戰役（拿破崙戰爭、當時義大利和匈牙利的戰爭），因為，他認為這會對革命運動有著重大意義。此外，他也開始閱讀克勞塞維茲的著作。⁶在1858年1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他就跟馬克思提到閱讀克勞塞維茲的事：“目前我正在讀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推理研究的方法很奇特，但書本身是很好的。……戰爭最像貿易。戰爭中的會戰就等於貿易中的現金支付，儘管它實際上很少發生，但一切仍以它為目的，而且它最後必將發生，並起決定性作用。”⁷所以，恩格斯就把“研究軍事問題作為自己專門的學問之一”。⁸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在1850年代後半可以說形成了一種學術上的分工關係。馬克思努力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來形構出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圖



像，而恩格斯則在《美國新百科全書》的條目編寫中，根據大量的實際材料，揭示了戰爭和武裝力量產生的歷史條件，徹底研究了軍隊發展最重要的階段和特點，指出了軍隊的組織、戰略和技術在不同歷史時代的變化。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軍事問題和戰爭的分析，基本上立基於兩個推論上的出發點：“物質生產關係”和“無產階級革命”。前者可以從恩格斯對於軍事科學的討論來切入，恩格斯強調要從物質生產關係來理解軍事發展的一切問題，他認為武裝力量的特點、裝備和戰術、部隊的編制和訓練方法、軍種演變等一切巨細靡遺的問題，都要取決於一定社會的生產力高低和從屬的生產關係。後者則可以從兩人對於1850年代國際局勢的分析來作為佐證，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以“階級”的框架來認識“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戰爭，這點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戰爭論述的主要特色之一。

恩格斯是從“經濟”來思考“政治暴力”，這一點從他《反杜林論》一書中對於“暴力”的討論可以得知：“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狀況』，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質手段為基礎的。”⁹ 恩格斯在《美國新百科全書》中曾寫過一個重要的條目〈軍隊〉，馬克思在閱讀過後就寫信給恩格斯說：“軍隊的歷史比任何東西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們對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之間的聯繫的看法是正確的。……市民社會的歷史非常明顯地概括在軍隊之中。”¹⁰ 在這個條目中，恩格斯從歷史的角度，將不同種類軍隊的興衰與各種社會經濟型態的形成和瓦解過程聯繫在一起，古希臘的軍隊及其方陣戰術以及古羅馬的軍隊及其較進步的軍團制度，都是以奴隸制的社會經濟關係為基礎的，如此，使得每個自由民出身的男子都要服兵役；到了中世紀封建制的經濟基礎取代了奴隸制的社會，全身披甲的“騎士”取代了



希臘羅馬時代的“重步兵”；¹²到了近代，隨著封建制度的崩潰和城市的興起促成軍隊的成分再度發生變化，一方面，軍隊的組成從早期地中海沿岸城市的“雇傭兵”到專制君主“常備兵”的發展（1445年法國國王查理七世成立近代第一支以本國人組成的常備軍），¹³另一方面，現代的“步兵”再次取代了已經喪失了戰鬥力的封建騎士隊，而不同於希臘羅馬時代，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上發展起來的常備步兵，是一種根據普遍義務兵役制編成的大眾性軍隊，亦即，一種“全民武裝”的真正成形。¹⁴恩格斯也特別側重於從物質生產和武器技術演進的角度來解釋兵種和戰術的變化，他就認為十四世紀初火藥從阿拉伯人那裡傳入西歐，促成了“大砲”和“火槍”（步槍）的出現：

火器的採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政治上的統治和奴役關係起了變革的作用。要獲得火藥和火器，就要有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為市民所占有。……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不住市民的大砲；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¹⁵

所以，我們可以說要有“市民”階級的出現，才得以組成現代“步兵”和“砲兵”這樣的兵種。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不僅是“商品”被大量生產，“士兵”也被大量製造出來了。

在1850年代的反動時期裡，馬克思與恩格斯透過大量政論文章的寫作來為革命進行準備，他們對國際局勢和歐洲各國國內政治的一切重大問題所作出的反應，都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作為考察的出發點。正如恩格斯在1854年發表的〈歐洲戰爭〉一文中就說：“不要忘記，在歐洲還有一個第六強國，它在一定的時刻將宣布它對全部五個所謂”大“強國的統治並使它們個個戰



慄。這個強國就是革命。”¹⁶ 所以，他們希望透過對於國際局勢的分析，來形成切實可行的革命戰略。¹⁷ 在整個分析裡頭，有三個歐洲國家和兩場大型戰爭是他們最為關注的，前者分別是俄國、法國和英國，後者則是發生在1853到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這場戰爭是從1815年到1914年之間最接近歐洲大戰的事件）和1859年法國和義大利對奧地利的戰爭。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俄國的沙皇制度和法國波拿巴體制是歐陸反動勢力的堡壘，兩人試圖透過克里米亞戰爭和法、義、奧三國戰爭的分析將其徹底暴露出來，這兩個反動勢力阻礙了歐陸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而對於英國分析的側重點，一方面是英國在世界經濟擴張中的主導地位，以及其所衍生出的殖民政策與當時殖民地所爆發的衝突。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分析裡頭，也會使得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分別觸及到了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問題。基本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代可以說透過內批波拿巴反動保守主義、外批殖民擴張主義而開闢出新的論述戰線。

從克里米亞戰爭的分析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討論了由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面臨解體，俄國、法國和英國列強之間為了強化在此一地區的地盤和影響力所導致的利益摩擦和衝突。俄國試圖出黑海進而控制巴爾幹地區，英法兩國則是站在土耳其這一方，試圖擴大對中東和近東地區的商品銷售市場並削弱沙皇。另一方面，在這些反動勢力的衝突背後，實際上抑制了土耳其和巴爾幹地區各民族的解放運動。上述這些就是當時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馬克思在〈戰爭問題〉一文中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對東方問題可以用幾句話概括如下：沙皇的這樣大的一個帝國只有一個港口作為出海口，而且這個港口又是位於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國人進攻的海上，這種情形



使沙皇感到不滿和腦火，因此，他極力想推行他的先人的計畫——開闢一條通向地中海的出路。……每當他認為土耳其政府的統治似有加強，或者發現斯拉夫人中有自我解放的更危險的徵兆，從而威脅到它對土耳其的計劃時，他就會故技重演侵入這個帝國。……另一方面，不堅定的、畏縮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強，起初由於害怕俄國侵略而鼓勵蘇丹反抗沙皇，而最後卻由於害怕一場大戰會引起一次大革命而強迫蘇丹讓步。¹⁸

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當時列強的統治階級試圖透過外交活動來鼓吹所謂的“保持現狀”，亦即，英法等國害怕真正大戰的爆發會引起革命，反過來威脅到它們的統治，而這樣的態度只會讓土耳其不能擺脫沙皇，巴爾幹的斯拉夫人不能擺脫土耳其帝國的腐敗狀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是，能發展出全歐反對沙皇的戰爭：“這些戰鬥只是其它更激烈的、更有決定意義的戰鬥的序幕，即歐洲各國人民反對那些目前勝利的和自以為鞏固的歐洲專制暴君們的戰鬥的序幕。”¹⁹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就指出，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催化、帶動了整體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變遷：

一個統一的義大利王國在1857年至1870年間出現；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在1862至1871年間形成，附帶拿破崙第二帝國的崩潰和巴黎公社的出現（1870-1871）；奧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並進行了根本性的改建。簡而言之，在1856至1871年間，除英國之外，所有的歐洲「大國」都發生了徹底的變化。²⁰

上述每一個部分的改變，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義大利和德意志的政治統一有關，由於涉及到舊體制的根基（法國的波拿巴和奧



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兩者的統一就意味著戰爭”²¹。在1857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馬克思認為，由於法國社會各階層的不滿有爆發革命的可能，“延緩法國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發一場歐洲大戰”²²。所以，歐洲正徘徊在“革命”與“戰爭”的十字路口上，而1859年發生的義大利戰爭就是法國和義大利的皮蒙特聯手來對抗奧地利的入侵，波拿巴就是企圖透過這樣的局部戰爭來阻止革命的爆發。²³對馬克斯和恩格斯而言，法國對義大利“協助”的最高原則就是：“永遠不會容許一個統一的、獨立的義大利存在”²⁴。這樣的局勢讓他們體會到，要達成無產階級的革命，就必須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任務，所以，義大利和德意志的統一就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最為關心的議題。恩格斯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匿名的小冊子〈波河與萊茵河〉(Po and Rhine)，他從軍事歷史與戰略的觀點來反駁德國「應當在波河上保衛萊茵河」這樣的主張，相反地，他認為德國應該支持義大利的統一和獨立：

這裡我們關心的只是問題的軍事方面，也就是，德國為了本身的防禦需不需要永遠統治義大利，特別是需不需要在軍事上完全佔領倫巴底和威尼斯省？……在設法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應當牢牢記住：我們這裡所說的德國，是指一個統一的國家而言，它對武裝力量的領導和它的行動都是由一個中心來實行的；我們不是把德國看作某種臆想的政治機體，而是把它看作一個真正存在的政治機體。否則，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德國的政治需要或者軍事需要。²⁵

恩格斯的這段話所透露的理論意義在於，他明確地指出從軍事力量的領導來界定民族國家，這點是值得注意的。此外，在分析上，他試圖從軍事戰略的觀點，來論證義大利的統一對於“未



來”統一的德國並非是不利的。由於拿破崙戰爭顯現出部隊的運動性，那些便於防衛的河流線就成為了重要的國界和戰線，²⁶這也就是所謂的“自然疆界論”（當代地緣政治思想的前身）。萊茵河就是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傳統疆界，波河（北義大利的波河河谷，包括倫巴底和威尼斯省）則是德國和法國的“古戰場”，對波河流域的佔領“間接決定著法國和德國的命運，直接決定著義大利的命運”²⁷。所以，當時德國就有軍事家和政治家依循自然疆界的觀點而主張“中歐大國論”，亦即，奧地利、普魯士及其它德國各邦在奧地利的霸權下來形成一個聯邦制的國家，這個“中歐大國”會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復活²⁸，如此，使德國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與法國逐鹿波河流域。恩格斯十分反對這種軍事思想的依據，他認為主張“中歐大國”的自然疆界會成為壓迫義大利的理據，此處，恩格斯已經表現出了一種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自決”的思考：

至於統一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這樣的：或者義大利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那時他將有它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絕對不會是法國的，也絕對不會是德國的，因此對我們也不會比對法國人更有害些……只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只要我們本身強大，不管我們是否佔領倫巴底，我們總會在義大利保持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如果我們不是把佔領別國領土和鎮壓別國民族當作自己力量的泉源，而是關心使自己在本國內成為統一的和強大的，那樣我們就會做得好一些。²⁹

誰都不能肯定說，歐洲的地圖已最後確定。但是一切改變，如果希望能長期保持，就應當從下列原則出發，這就是應當愈來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歐洲民族具有由語言和共同感情來確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軍事觀點在這裡只能具有次要的意義。³⁰



恩格斯透過對波河和萊茵河的戰略討論，也就將義大利和德國統一的問題密切聯繫起來，一方面批判德國（特別是佔統治地位的封建容克地主）在義大利戰爭期間的態度，另一方面，希望法國的戰敗將會使得人民革命的力量獲得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民族自決”的問題，更明確地表達在反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剝削上。他們特別關注了三個英國重要的殖民地：中國、印度和波斯，他們觀察了當時所發生的相關重大事件：1839年到1842年和1856年到1858年對華的鴉片戰爭、1857年到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義、1856年到1857年英國和波斯之間的戰爭。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就試圖將兩地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來說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對於歐洲革命的意義：

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這將是一個奇觀：當西方列強用英法美等國的軍艦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運河口的時候，中國卻把動亂送往西方世界。³¹

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國〉一文中，透過中國與波斯兩者對英國作戰抵抗上的不同，而認為中國出現了“人民戰爭”的形式：“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就了這一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並使之表現為一場滅絕戰。”³²

在上述的分析中，有兩個理論的思考方向是我們試圖要去掌握的：首先，我們要注意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民族主義”的立場。基本上，十九世紀的歐洲是“民族的春天”³³，民族國家的創建是當時主流的政治議題。所以，共產主義革命的發展必須



在民族主義的激昂情緒中交錯成長，在這樣的氛圍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是去反對民族國家，而是去思考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為無產階級革命創造有利的條件才是他們的重點。以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是必然的，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條件，所以，他們站在這樣的立場上，一方面反對法國的波拿巴體制，一方面熱切支持德國和義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統一。因為，正是歐洲的舊體制阻止了德國和義大利的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統一，而它們的統一就會促使舊體制的瓦解和無產階級革命階段的到來。其次，馬克思和恩格斯透過對殖民問題的討論，試圖將歐洲的國家革命與第三世界殖民問題聯繫起來，這裡存在的思考突破是，將歐洲民族國家體系（列強之間的戰爭）的問題擴展到全球（第三世界的瓜分）。馬克思與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的擴張過程中，將“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問題聯繫在一起，這也凸顯出西方現代性的一個重大特點：

現代主權是一個歐洲的概念，這句話表示現代主權主要是在歐洲發展，並和現代性的演進同步。……雖然現代主權是從歐洲產生，然而，它大部分是透過歐洲與其外部的關係，特別是透過殖民計劃以及被殖民者的反抗，所誕生並發展的。於是，現代主權就是就是以歐洲的反動與支配——在其疆界內外——之概念而顯現。它們是在同一發展下，共同擴張且互補的兩面：在歐洲內部的統治，以及歐洲對世界的統治。³⁴

所以，“民族國家的主權”和“殖民主權”分別體現了西方現代性的兩個側面，對內創建民族國家，建構民族的自我認同，對外則擴張殖民地，來建立它者肯定自我。³⁵



總體而言，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歐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仍然是“在野勢力”，相較於那個時代一些突出的政治家（俾斯麥、加富爾、拿破崙三世、格萊斯頓）嫻熟地將政治管理與政府機器的外交控制相結合，適度順應著政治與社會的變化，將歷史的轉向有利於他們自己，從而消磨了革命所需的動力凝聚。或許一直要等到二世紀初，列寧及其黨員“佔領”了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俄國，才使得共產主義在世界政治權力的分配上獲得真正的主導性。而上述兩個理論面向的關懷，也可以在下一節對於列寧論點的討論中獲得更進一步的延伸。

三 國家與革命：列寧的轉向

儘管在列寧的文章中並未流露出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思想色彩，不過，俄國所處的政治形勢卻使得在他心中浮現出一個與民族主義相關的問題：如何“創建”並“保衛”一個共產主義的俄國？正如同拿破崙體認到法國新生的資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獨存於舊體制的歐洲因而啟動了著名的拿破崙戰爭，列寧也要為俄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權打造出一個得以生存的政治環境（二戰後形成的冷戰政治結構），亦即，從封建與資產階級的鬥爭轉變為資產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正是在這樣的立基點上構成了列寧解讀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主義理論的起點。十九世紀末到二世紀初的俄國是一個革命與戰爭交錯擺盪的年代，傳統帝制的漸趨崩解、內部階級勢力的蠢動、外部敵人的壓迫，種種情勢都迫使身為一個革命政黨領導者的列寧，必須為俄國提出一個生存之道。同時，對於身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列寧而言，他也必須提出一種適合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爭理論。從列寧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政治意圖融合的嘗試，一方是，馬克思所提出的全世界無產階



級革命的宏偉大業，另一方則是，克勞塞維茲其尋求德意志統一和獨立的民族國家之理想，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兩股思潮交會的歷史場景。

在這一節中，我們嘗試以列寧在戰爭期間所寫的兩本重要的小冊子來作為討論的核心。首先，是1916年所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他試圖去辨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本質，以及俄國的參戰對於社會主義前途的意義，其中“民族自決”的主張對於後來冷戰架構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其次，則是1917年所出版的《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The State and Revolution*)，整個核心的論證就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命題之上，列寧以此來說明無產階級革命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且，更為重要地是，使無產階級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中獲得掌握國家武力的正當性。在這樣的立論基礎上，列寧進而去處理“民族自決”、“廢除武裝”、“和平主義”等等，當時在黨內與國際間的重大爭論議題。所以，基本上，“民族自決”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對馬克斯和恩格斯共產主義理論的詮釋核心，列寧利用這樣的理論工具，一方面批判了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例如：考茨基）³⁶，另一方面，則是用來應付當時政治變局的具體主張，主要的事件包括：俄國革命（1906、1917）、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俄國內戰（1918–1920）。從理論的觀點來看，民族自決、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可以說是列寧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中所提煉出來面對戰爭狀態的理論主張。

（一）“帝國主義”與“民族自決”

在二〇世紀初期，如何對當時歐洲民族國家的擴張模式進行解釋，成為學術界的重大課題³⁷，“帝國主義”也引導了當時許



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論戰）方向。³⁸基本上，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在理論上並非創新之作，不過，相較於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976）等人，他最重大的特點與貢獻就是在於從帝國主義的經濟分析中引導出政治革命的具體實踐方向。盧卡奇（Gerog Lukács）在其所著《列寧》（*Lenin*）一書中就提到：“列寧的過人之處——而且這是無與倫比的理論成就——在於他把帝國主義的經濟理論與目前時代的各種政治問題具體地結合起來，從而使這個新階段的經濟學成為這種關鍵場合中的一切具體行動的準則。”³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列寧已經開始注意到克勞塞維茲的著作，1915年時他完成了《戰爭論》一書的筆記⁴⁰，他強調：“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從這個觀點（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出發來考察各種戰爭的。”⁴¹列寧的這項研究工作可以說奠定其整體政治實踐的重要理論基礎：

列寧的原創性貢獻在於，將克勞塞維茲的思想從研究1789年（最初為資產階級的）革命繼續引入1917年的無產階級革命，並認識到，從國家和民族間的戰爭變為階級戰爭的戰爭，取代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經濟危機。列寧用“戰爭即政治的繼續”這一公式澄清了“革命鬥爭中的幾乎全部核心問題：對世界大戰的基本認識（階級分析）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機會主義、保衛祖國、民族解放鬥爭、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戰爭與和平及革命與戰爭的關係、通過工人階級的顛覆活動以內部結束帝國主義戰爭、布爾什維克黨綱的修正等等”。⁴²

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克勞塞維茲戰爭命題結合的基礎上，列寧提出了他對當前戰爭的“政治”認識。一個重要的立論就是，當前的戰爭不是“民族主義”的戰爭，而是“帝國主



義”的戰爭，“不研究這個問題（指帝國主義），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認識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⁴³：

能夠證明戰爭的真實社會性質，確切些說，證明戰爭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所有交戰大國統治階級的客觀情況的分析。為了說明這種客觀情況，應當利用的，不是一個例子和個別的材料……而必須是關於所有交戰大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⁴⁴

身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在列寧眼中的“政治”，正是以“生產關係、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政治，所以，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決定了戰爭的形式，列寧就指出：“法國大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從那時起到巴黎公社為止，從1789年到1871年為止，戰爭的類型之一就是具有資產階級進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質的戰爭。”⁴⁵ 在反封建的立場上，資產階級的戰爭是進步的，而當前的戰爭，正是屬於此一戰爭類型的延續，只不過列寧認為，隨著資本的積累發展，當前的生產關係是以金融資本所形成的生產集中和壟斷為特徵，而這就是列寧所謂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就是其所引導出來的戰爭—政治的表現形式。

在上面的論證基礎上，列寧解釋了當前戰爭的成因並形成了他的批判。為什麼會發生這場帝國主義的戰爭？列寧的回答是：“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瓜分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麼其它辦法呢？”⁴⁶ 這也就是說，生產關係的變化引發了各國實力對比的變化（主要是指大英帝國勢力的消退，德、美等國競逐霸權的歷史進程），原



先的勢力範圍需要被重新界定，來呈現出新的權力狀況，各強權國在1880年代後所強化的殖民政策，其具體表現就是對世界的重新瓜分。列寧反對考茨基將當時的殖民政策視作是對農業區域的兼併，他認為世界早已瓜分完畢，金融資本所形成的生產集中和壟斷，使得各強權國必須走上持續壟斷的結構性發展，所以，勢必只能削減對方的力量對世界進行重新瓜分，這也就是當時一系列戰爭發生的原因。

列寧主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論述上也可以說是反對考茨基將帝國主義視作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政策”反映⁴⁷，並且，考茨基將兼併視作是“金融資本比較偏好的政策”⁴⁸，列寧認為，這就會拆解了經濟和政治的聯繫，因為，照考茨基的說法，金融資本似乎也可以選擇非壟斷、非暴力的政策。所以，列寧認為考茨基只批判了托拉斯，而沒有觸動到它的經濟基礎，更不可能形成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批判，只會走向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平主義⁴⁹。列寧也痛斥了考茨基在上述基礎上所提出的“超帝國主義論”，考茨基認為壟斷最終會造成各帝國主義的聯合，而超越當前的戰爭階段，列寧認為這好比說從非和平的瓜分會進展到和平的瓜分，他強調各強權國之間的權力是異質的、不平衡的：“金融資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世界經濟各個部份在發展速度上的差異。既然實力對比產生了變化，那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⁵⁰考茨基妄圖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來謀求永久和平，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政治構想，列寧認為這是“對群眾進行最反動的安慰”⁵¹，其反動之處就是在於，這樣的論述沒有告訴群眾，壟斷對抗壟斷、一個帝國主義對抗另一個帝國主義是當前的現實。列寧強調，不論各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盟形式如何，或是所有帝國主義大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兩次戰爭之間的喘息：



和平的聯盟準備著戰爭，同時他又是從戰爭中生長出來的，兩者相互制約，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繫和相互關係這個同一基礎上，形成和平鬥爭形式與非和平鬥爭形式的彼此交替。⁵²

盧卡奇在詮釋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時就指出：“歷史擺在無產階級面前的問題，不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作出選擇，而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用戰爭——國內戰爭——反對這種戰爭之間作出選擇。”⁵³

不同於考茨基，列寧從“帝國主義—民族自決”的架構，來提出他的政治構想。如同上述，儘管列寧依循著馬克思理論的基本立場，對當時的世界局勢提出“帝國主義戰爭”的解讀。不過，當時的世界大戰所帶有的民族主義性質，並非是純粹知識認識上的改變就可以取消的，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形式是列寧必須要去面對的。所以，對列寧而言，民族自決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交會點，而整個思考重點是放在，如何藉由民族自決形成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有利局勢？

列寧與馬克思有著不同的政治處境，作為一位馬克思理論的信仰者，列寧仍緊守著“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信條。不過，面對俄國這個仍處於“中世紀的國家”，列寧無法等待馬克思所說的先進資本主義的結構變化，他也認知到民族國家已是不可迴避的政治形式，⁵⁴他必須要透過這樣的形式來召喚革命的群眾。他認為，帝國主義的統治關係弔詭地為民族自決造就了有利的局勢（列寧引用了希法亭的看法）：

在新開闢的地區，輸入的資本加深了各種的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覺的人民對外來者愈來愈強烈的反抗……資本主義本身在逐漸地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



於是他們也就提出了歐洲民族曾經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目標：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作為爭取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⁵⁵

列寧從帝國主義的解釋觀點，指出現在世界有兩種民族：“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所以民族自決就是“反對任何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徹底表現。”⁵⁶ 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民族自決概念的界定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合體的國家分離，就是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⁵⁷ “試問，對一個民族來說，還能有比分離的自由，比成立獨立民族國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嗎？”⁵⁸ 列寧進一步論證說：“正如人類只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才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一樣，人類只有經過所有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的過渡時期，即他們有分離自由的過渡時期，才能導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⁵⁹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列寧的政治構想是，由於所面對的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型態，他就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轉換為壓迫與被壓迫民族的鬥爭，如此，革命所召喚、啟蒙的對象不再僅是城市的工人，而是被壓迫的民族。列寧希望透過民族自覺的號召，使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國際性格與階級團結。對列寧而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無法獲得解放、消弭戰爭的。所以，整體的戰略行動首要的是，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轉變為（被壓迫民族的）國內的階級戰爭⁶⁰，無產階級的政權才能促使國家消亡、民族融合、真正地消弭戰爭。⁶¹ 回首歷史，列寧的政治構想如同馬克思一般也失效了，不過，卻造成了二十世紀巨大的影響，民族自決的號召造成滾滾的革命浪潮、各地共產政權的建立，引起了西方盟國的憂慮，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提出了十四點計劃作為回應，“計畫中玩起民族主義牌，以對抗列寧國際人民聯合的呼聲”⁶²，兩種民族自決的對立，形成了未來冷戰架構的最初原型⁶³。如同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



的意義，冷戰讓我們更明確地理解到戰爭不僅是國家之間衝突的表現，更是一種不同社會系統（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等等）之間的戰爭。

（二）“無產階級專政”與“國家消亡”

如果列寧是用“帝國主義—民族自決”這個思考架構，維護了馬克思“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那麼，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他就以“無產階級專政”（而非資本主義的危機）這個命題，來保證馬克思理論所說的“國家消亡”、“共產主義社會”來臨的歷史進程。而此一命題的提出是與戰爭和革命的局勢密不可分的，列寧在該書的“序言”中就提到：

曠日持久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禍和災難，使群眾生活痛苦不堪，使他們更加憤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踐的意義了。……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個正式的社會黨內佔統治地位的沙文主義流派。……這些“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恭屈膝的迎合態度。……如果不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就無法進行。……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⁶⁴

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對於列寧而言，在戰爭期間提出國家的問題，既是思想辯論上的戰鬥也是政治實踐的戰鬥，亦即，在“保衛俄國無產階級政權”和“全世界無產階級



革命”雙重政治軸線上的戰鬥。這是一種在戰爭狀態中所形成的政治思考，也正是從這樣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所引導出的理論主張，使列寧對“國家”問題的討論不同於馬克思或其後許許多多的馬克思主義者。後者主要是涉及到在1970年代對“國家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of state）的辯論（例如：Miliband、Poulantzas等人），他們關注於國家的結構和功能，然而，列寧卻專注於如何獲取政治權力和保衛一個新的國家。⁶⁵

列寧是在1917年第二次俄國革命前夕，完成了《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他在裏頭仔細地檢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列寧提出“誰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⁶⁶ “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⁶⁷ 對列寧而言，「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只有透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國家真正的消亡。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認為：“國家的終結為馬克思的思想確定了方向……在他關於國家消亡的理論中，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論題占有它應有的位置，這儘管還不構成一種積極的國家理論，但卻足以決定了一種消極的（批評性的）立場。”⁶⁸ 所以，基本上，列寧試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的討論，來使“無產階級專政”此一主張獲得理論上的位置，反過來說，也必須要透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才能真正達到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政治使命。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消亡”的討論，會涉及到他們對於“國家—社會”的理論立場。恩格斯在1884年所出版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就提出了如下的觀點：



國家絕不是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⁶⁹

對恩格斯而言，國家是在社會劃分為階級的地方和時候、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出現的時候才出現的，國家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時的產物。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就是從原始的氏族社會（無階級的社會）、奴隸制、農奴制到資本主義社會，而在每一個階級劃分的社會中，經濟上的剝削關係往往表現為政治上的統治關係。在這樣的討論中，列寧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東西使它們居於社會之上？”⁷⁰ 這個問題就會聯繫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特殊性（暴力工具的使用）的討論，亦即，“公共權力”，他們認為其主要的的作用就是一個階級用來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⁷¹。馬克思在1852年所發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在說明公共權力的擴張和延伸與階級統治的關係：

這個行政權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拿破



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這種分工隨著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團，即造成用於國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擴大起來。⁷²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階級對立關係的解消，就會使得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和進行剝削的國家機器消亡。恩格斯在1877年發表的《反杜林論》一書中明確地提出了關於“國家消亡”的論點：

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⁷³

列寧認為“國家的自行消亡”容易受到詮釋上的扭曲，使馬克思主義變成機會主義：“似乎變化就是緩慢的、平穩的、逐漸的、似乎沒有飛躍和風暴，沒有革命。對國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眾化的理解，無疑意味著迴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⁷⁴ 列寧認為我們應該要仔細解讀“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這句話：“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裡所講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他講的自行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



餘。”⁷⁵ 所以，從列寧的詮釋來看，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不會自行消亡的，而是要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加以消滅的。列寧更進一步地提出一個問題：“怎樣才能把恩格斯從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時候為止，一再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這一頌揚暴力革命的論點，同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結合在一個學說裡呢？”⁷⁶ 這樣的一個提問可以說清楚地表達出列寧在整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國家學說中最重要的理論關懷，他的理論立場就是：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⁷⁷

所以，列寧從國家消亡論的整理中，一方面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應有的理論位置，另一方面也使無產階級專政成為他在革命實踐中最重要的理論武器。此外，在這樣的詮釋裡頭還包含著一層理論意涵，亦即，從資產階級社會過度到無產階級社會的問題，列斐伏爾就注意到從此一角度來理解“無產階級專政”此一命題在馬克思理論中的意義：

對於馬克思來說，他自認為他的著作中的新東西就是發現了各個階級和它們之間鬥爭的歷史條件，特別是得出這樣一個論點，根據這個論點，這些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又是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階段，是一個過渡性時期。⁷⁸



從馬克思的著作來看，一直要到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一文中，他才仔細地說明了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階段發展問題，在這樣的兩階段論中存在著一個過渡時期：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⁷⁹

列寧充分地掌握了馬克思在晚期革命實踐上的思想變化，他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出現以前，從未討論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⁸⁰。這裡值得我們去注意的一個時代環境就是，巴黎公社是普法戰爭的產物(德國軍隊入侵法國巴黎，工人要自己保衛祖國)，戰爭的形勢造成了具體革命實踐策略上的改變，這樣的事件也同時使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產生了變化。列寧緊抓著這個理論上的轉轍點，然後回過頭去對照1848年到1851年的革命經驗，他希望能夠透過兩次革命經驗的對比，來釐清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應有的立場，從而能夠更深刻地來賦予“無產階級專政”此一命題在理論上的意義。在1847年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馬克思的說法是：“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⁸¹此處，馬克思提出了以暴力來作為階級鬥爭的方式，但是，還沒有明確提出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最重要的革命手段。在歷經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的實際經驗之後，他們為1872年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作序時指出：“這



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⁸² 列寧認為要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來詮釋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段話的想法：“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⁸³ 為了強化這個論點，列寧也引證了1871年4月12日，當巴黎公社存在的時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就寫到：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大革命的下一次嘗試不應該再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打碎，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⁸⁴

從列寧的角度來看，巴黎公社的經驗使得馬克思意識到“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⁸⁵ 立基在階級鬥爭之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無法自我取消的，在資產階級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度期間，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來打碎、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巴黎公社”正是無產階級專政適當的政治形式。恩格斯說：“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⁸⁶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一文中就說：“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⁸⁷ 他也嘗試為“巴黎公社”作出了闡釋：

人們對公社有多種多樣的解釋、多種多樣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這證明公社完全是一個具有廣泛性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



的壓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⁸⁸

所以，列寧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度期中，發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更為精確的理論位置，並且，也以打碎、摧毀資產階級國家來使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恩格斯就曾提到過：

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但有可能談到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共同體”（Gemeinwesen），這是一個很好的古德文詞，相當於法文的“公社”。⁸⁹

最後還留有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要如何專政、如何掌握政權呢？這個問題牽涉到了共產主義發展路線的爭議，亦即，“議會路線”還是“武裝暴力”？共產黨員應該要利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普選的方式來獲得政權？還是要將人民武裝起來進行一場內戰？俄國的總體情勢，使列寧無疑是偏向後者的，正如同他十分重視恩格斯在1872年〈論權威〉一文中的一段話，這也是恩格斯對於巴黎公社武力運用的經驗總結：

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砲，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也太少了嗎？⁹⁰



這樣的立場也使得列寧在討論當時“廢除武裝”的爭議時，他就指出如下的看法：“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掌握武器、獲得武器，那他只配被人當作奴隸對待。”⁹¹

總體而言，“無產階級專政”可以說是列寧革命實踐與國家理論上最重要的關懷核心，這樣的一個核心關懷也根源於列寧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一種共鳴性，亦即，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面對了由普法戰爭的形勢所激發出的巴黎公社之革命實踐，而列寧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勢下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主張。透過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使得無產階級以“政黨”來取得“國家”的形式，在主張廢除資產階級國家“常備軍”的同時，卻又進行著“人民武裝”（arming the people）。此處，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發現到“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革命實踐策略的巧妙性，它讓列寧可以融合了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國家的主張，他不僅打造了俄國，還為未來系統性的冷戰對抗吹響了前進的號角。

四 游擊戰與第三世界革命：從克勞塞維茲到毛澤東

在歷史上，非正規的武裝戰鬥力量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不過，一直要到1808到1813年期間，西班牙人民向拿破崙大軍進行普遍抵抗的時候，游擊戰（guerrilla war）才獲得理論上的討論（特別是克勞塞維茲）。⁹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游擊行動是在歐洲戰場的外圍發揮重要的影響力，特別是阿拉伯半島上的獨立運動，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一書可以說總結了沙漠游擊戰的經驗。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游擊戰就變得是無所不在的現象，凡是在德國和日本佔領的國家都有游擊戰的發展（俄國、波蘭、巴爾幹地區、法國、阿爾巴尼亞、希臘），它甚至於是邱吉爾戰爭政策



的一部分，在英國的作戰計畫中，有特殊的部門來專門製造和培養反抗運動。⁹³ 此外，早從192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在進行長期且大規模的游擊戰（從國共內戰到抗日戰爭），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員成為游擊戰中的戰鬥主體，並且，游擊戰也成為第三世界最主要的鬥爭形式。在霍布斯邦的研究中就為我們描繪出一個簡明的歷史圖像：

1950年代的第三世界，充滿著層出不窮的游擊戰鬥，而這些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殖民勢力（或移居當地的殖民者）不願放手讓前殖民地輕易和平立國的國家裡——如分崩離析的大英帝國制下的馬來亞、肯亞毛毛運動，和塞浦路斯。至於其中最嚴重的戰事，則發生在日薄西山的法蘭西帝國內部，如阿爾及利亞與越南。⁹⁴

儘管這些第三世界的游擊戰爭與共產主義革命不必然存在著直接的聯繫，但是，實行游擊戰最為成功的頭號隊伍就是越南共產黨，它以游擊戰爭的形式先後擊敗了兩大強敵法國和美國。而1959年卡斯楚以及他那位最重要的革命同志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一起取得了古巴的政權，同樣使得游擊戰成為世界頭版的事件。基本上，從十九世紀初期，西班牙人民對拿破崙軍隊進行頑強的抵抗開始，就揭開了現代游擊戰的序幕，它所造成的效應一直影響到至今我們人類的生存樣貌。而從戰爭理論的角度來看，一直要到二世紀，從共產主義實際的革命經驗中，才讓我們認識到游擊戰所帶來的理論思考上的爆發力，這些革命戰鬥也為現代游擊戰史上寫下了鮮明的一頁。

施米特在1963年時所出版的《游擊隊理論：政治概念附識》
(*Theorie des Partisanen: Zwischenbemerkung zum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書相當值得注意。在該書中的一條主要討論軸線就是，從國際法的角度來思考現代游擊戰爭的問題。此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施米特是以“游擊隊”（游擊隊員）來作為思考游擊戰的起點，⁹⁵ 這樣的起點也透露出他的問題意識，亦即，游擊隊（員）在國際法上的權利和地位問題。他認為在古典歐洲的國際法中幾乎排除了游擊隊（員）的問題：“歐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定義的戰爭，是一支國家正規軍與另一支國家正規軍展開的國家之間的戰爭（*zwischenstaatlicher Krieg*）。”⁹⁶ 所以，在傳統國際法以主權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框架下，游擊隊（員）是缺乏法律地位的，甚至於連作為一個戰俘的基本權利都沒有。但是，隨著當代游擊戰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或者說造成正規部隊極大的困擾），如何將游擊隊員納入法律的框架成為國際法上的現代性難題。施米特沿著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他清楚地意識到實際的游擊戰鬥造成了既存法律框架的緊張性，進而促使傳統國際法的改變和演進（這樣的演進包括了1813年的普魯士戰時總動員令、1907年的海牙陸戰法規、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這樣的思考方式可以說是與社會學相當貼近的。就像施米特自己就說：“游擊隊員是可靠的基點，因為游擊隊員能夠不受一般哲學史譜系的影響，回到革命發展的現實。”⁹⁷ 此外，如果我們暫且拋開國際法層面的問題，施米特以游擊隊（員）作為討論的出發點還具有一層理論意義，亦即，他試圖從游擊隊（員）來掌握拿破崙戰爭之後現代游擊戰的問題，否則，如同我們上面提到過，在人類過去每一個歷史時代都不斷出現過游擊戰的現象，如果從游擊戰本身來出發在經驗上的無窮性將會造成理論思考上的困難。所以，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簡化施米特想要提出的問題就是：“誰是現代的游擊隊員？”針對這樣的問題，施米特指出了一條思考游擊隊的理論線索：



1808至1813年期間（指西班牙游擊戰），這些普魯士參謀軍官的思想世界裡已經孕育著《戰爭論》的萌芽……克勞塞維茲提出戰爭即政治的延續，這一提法已經簡要地包含著一種游擊隊理論。正如我們將指出的，這種理論的邏輯通過列寧和毛澤東臻於完成。⁹⁸

在施米特的想法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指出了從克勞塞維茲經列寧到毛澤東是一條思考游擊隊理論的重要軸線，施米特正是透過條理論軸線豐富了我們對於現代游擊戰爭的認識。其次，我們也可以發現到，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的游擊隊理論可以說先後得到了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這些不同思潮與人物的思想萃煉，而克勞塞維茲的“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此一古典命題，在思考現代游擊隊理論時仍會是一個適當的起點。

施米特在《游擊隊理論》一文中反覆地提到一句話：“游擊隊非正規地作戰著。”⁹⁹（Der Partisan kämpft irregular.）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命題，“非正規性”（Irregularität）標示出游擊隊（員）的根本特點，這也是認識現代游擊戰的關鍵鑰匙。在1808至1813年之間，拿破崙的大軍入侵西班牙，人民的游擊隊第一次與現代的正規軍隊相遇，他們也是第一個敢以非正規的方式來抵抗第一批現代的正規軍，史密特說明了此一歷史事件的理論意義：

正規與非正規作戰的區別，取決於正規的精確性（Präzision des Regulären）；法國革命戰爭中出現了一種現代的組織形式，正規與非正規作戰的區別最先在這種形式中找到其具體的對立面，由此形成（正規與非正規的）概念。……就整個游擊隊理論而言，（游擊隊的）非正規力量及其意義，取決於游擊隊所質疑的正規力量及其意義。正是在法



蘭西的國家以及法蘭西軍隊中，國家以及軍隊的這種正規性質通過拿破崙獲得了新的精確規定。¹⁰⁰

從引文的論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拿破崙戰爭形成了“正規／非正規”此一差異的認識基礎，在絕對戰爭中還內含著現代游擊戰的根芽，並且，在概念建構上，“非正規性”是以“正規性”的精確界定為前提，“游擊隊員的非正規性始終取決於具體的正規性的意義和內容”¹⁰¹，也正是從正規戰爭的精確性中來理解游擊戰的現代性。¹⁰² 在傳統歐洲公法的框架下，戰爭始終受到限制（界定），正規的戰爭必須在國家的軍隊、主權的擔綱者（*souveränen Trägern*）之間來進行，正規的戰士身著軍裝（這就會使得軍人／平民、作戰／非作戰人員嚴格地區分開來）、公開展示武器，而游擊隊員則是在黑夜隱蔽中而行，所以，在這種古典的正規性之下游擊隊只能是“邊緣現象”（*Randerscheinung*）。從歷史的發展角度來看，在十七世紀的時候，非正規的游擊隊員不過是一些流氓、流浪漢，他們被視作是罪犯被排除在法律之外，而在十八世紀則屬於輕裝備部隊，他們何以在1812-1813年之交的某一時刻成了英雄形象，然後在我們這個時代甚至成了世界事變的關鍵人物？拿破崙戰爭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轉徹的地位，最重要地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普遍徵兵制的實施使得戰爭從過去的“內閣戰爭”（*Kabinettkrieg*）轉變為現代的“人民戰爭”（*Volkskriege*），一種由全民參與的作戰。施米特認為這就又會同時使得既有的正規性限制受到了挑戰，因為，出現了種種古典戰爭法難以解決，甚至無法解決的情況，例如：臨時性的群眾起義、義勇軍、志願兵等情況¹⁰³，這就提供了非正規性在理論認識上從正規性中分化出來的可能性。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一書的第六篇“防禦”中，利用其中一章討論了“人民武裝”的問題，我們可以仔細來檢視克勞塞維茲在開頭所寫下的這一段話：



在文明的歐洲，人民戰爭是十九世紀才出現的現象。對於這種戰爭，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在反對的人中間，有些基於政治上的理由，把人民戰爭看作是一種革命的手段，是公認為合法的無政府狀態，認為這種狀態對國外的敵人固然危險，但對國內的社會秩序同樣是危險的。有時則基於軍事上的理由，認為進行人民戰爭是得不償失的。第一種看法同我們這裡所談的問題沒有關係，因為我們僅僅把人民戰爭看作是一種戰鬥手段 (Kampfmittel)，也就是只從用它對付敵人的角度來考察它。但是，關於第二種看法，我們不能不指出，一般說來，人民戰爭應該看作是戰爭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突破了過去人為的限制的結果，看作是我們稱之為戰爭的整個發酵過程的擴大和加強。¹⁰⁴

如上所述，克勞塞維茲把“人民戰爭”（特別是游擊戰鬥的形式）視為是他那個時代嶄新的現象。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儘管他觀察到人民的游擊戰鬥會造成既有的戰爭形式的改變，但是，他還是強調從軍事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人民戰爭，當時的游擊戰僅僅被他視作是一種戰鬥手段上的選擇，而非一種政治革命的形式，在這點上，克勞塞維茲可以說延續了十八世紀對游擊隊的認識傳統。如同施米特就提到：“在十八世紀，Parteigänger（德文中對應於Partisan的字）屬於輕騎兵和步兵以及其它輕裝軍種，它們作為靈活機動的部隊‘分散地短兵相接’，進行與正規軍隊較緩慢的戰役相反的所謂小規模戰鬥。在這裡，正規與非正規的區別，純粹是從軍事技術上來考慮的。”¹⁰⁵ 簡單地來說，克勞塞維茲仍受限於正規性的思考框架，所以，還無法完全認識到非正規的游擊隊所內含的一種自發、自主的政治意義，這也是當時整體普魯士軍官們思想上的共同限制。施米特就指出，在1808至1813年的西班牙游擊隊以及繼之而起在1813年德國境內短暫出現的游擊戰鬥，都同樣有下述相同的政治狀況：



（西班牙）游擊隊在自己的比較狹小的故土作戰，其國王和王室並沒有真正明白誰是真正的敵人。就這一方面而言，當時西班牙的正常當局的態度與德國沒有不同。此外，西班牙的狀況是，有教養的貴族、僧侶和市民階層很大程度上親法，同情外來佔領者。在這方面，德國也有類似狀況。德國大詩人歌德賦詩謳歌拿破崙，德國知識界始終沒有明白自己究竟屬於哪一方。¹⁰⁶

此處，施米特很清楚地說明了游擊隊的政治意義，亦即，當西班牙和德國的上層社會還分不清敵我關係的時候，游擊隊員就立基在保衛國土的基礎上，為自己的國家指認、辨識誰是真正的敵人（wirkliche Feind），或者用更為貼近施米特的理論語言來說就是，“游擊隊具有區分敵友的政治決斷力”。克勞塞維茲並沒有完全清楚地意識到當時西班牙和德國游擊隊所有具有的這一層理論意義，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的革命者列寧手上，才使得游擊隊理論在這點上產生突破。¹⁰⁷

在上一小節的討論中我們曾經提到過，列寧排除了議會民主的革命路線而主張武裝鬥爭，如此使他擺脫了恩格斯晚期思想索帶給黨內的路線爭議，而這樣的主張正是由於列寧認識到：“暴力以及流血的革命內戰和國家間的戰爭不可避免，進而肯定了游擊戰是整個革命進程的必要成分。”¹⁰⁸ 列寧強調：“僅僅根據人們對政治口號的態度來劃分派別是不夠的，還必須根據人們對武裝起議的態度來劃分派別。”¹⁰⁹ 施米特從列寧所作的《戰爭論》一書的讀書筆記中，為我們指出列寧的思考在游擊隊理論發展上的意義：

列寧以這種方式寫下了世界史和思想史上最偉大的篇章之一。透徹觀察、思考這些摘錄、邊注、著重號和驚嘆號，可以推衍出決定著戰爭時代和現代冷戰方法的關於絕對戰



爭 (absoluter Krieg) 和絕對敵對性 (absoluter Feindschaft) 的理論。¹¹⁰

基本上，列寧對於游擊戰的思考是和“絕對敵對性”這個概念相輔相成的，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可以區分出列寧在兩個理論方向上的貢獻：首先，相較於克勞塞維茲，列寧體認到游擊戰作為一種武裝鬥爭手段的政治意義，亦即，辨識敵人、區分敵友，身為職業革命家的列寧使游擊戰擺脫了在正規戰框架中的模糊性和有限性。其次，承認絕對的敵對性是列寧勝過其他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之處，他的實際的絕對敵人就是資產階級，對敵人的認識是列寧強大的打擊力量的秘密所在，“現代的游擊隊員是真正的非正規者，並因此成為對現存資本主義制度最強有力的否定，成為敵對性真正的貫徹者。”¹¹¹ 列寧對於游擊戰和絕對敵對性的想法主要是立基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經驗之上，當時他透過〈莫斯科起義的教訓〉和〈游擊戰爭〉這兩篇文章來仔細地闡釋了他的想法：

馬克思主義者是主張階級鬥爭的，而不是主張社會和平的。在尖銳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一定時期，階級鬥爭就會徑直發展成為國內戰爭，即兩部分人之間的武裝鬥爭。……與其說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鬥爭，不如說是兩部分人之間的鬥爭。……在這樣的時代……起義採取遍及全國的長期的國內戰爭這種更高的更複雜的形式，即採取兩部分人之間的武裝鬥爭形式，者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這樣的戰爭，只能是連續發生的幾次間隔較長的大戰役和大量的、在這些間隔期間內發生的小衝突。¹¹²

無論十月以後的俄國革命的總的進程或莫斯科十二月期間一系列事件的發展，都驚人地證實了馬克思的



個深刻的原理：革命向前進展是由它產生了一個團結而堅強的反革命，也就是說，革命迫使敵人採取愈來愈極端的防禦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來愈強有力的進攻手段。……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的鬥爭走到了各種組織的前面，由罷工發展成了起義。……它迫使反動派採取極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採取極端的進攻手段的時機大大提前到來。¹¹³

在這兩段引文中，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到列寧思考中關於“絕對敵對性”的想法，在第一段引文中，列寧一方面強調在危機的狀態中，階級鬥爭就是一種兩部分人之間的內戰，所以，這也就是一種敵對關係的建立。另一方面，他提出以游擊戰來作為內戰的一種策略和武裝鬥爭的方式。至於第二段引文，他就進一步說明革命與反革命兩方攻擊與防禦力量的不斷地互動增強，也就會使得雙方的敵對性達到一種極端與絕對的程度，而游擊戰也會成為展現絕對敵對性的形式。

列寧以絕對的敵對性摧毀了歐洲傳統的正規性，如同施米特所說：“列寧所造成的哲學與游擊隊員的結盟，出人意外地引發了新的爆炸性力量，炸燬了拿破崙想挽救的、維也納會議希望修復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整個世界。”¹¹⁴ 絕對敵對性的戰爭根本不會去承認正規性的限制，絕對敵對性本身就可以賦予戰爭具有意義。列寧在面對革命期間群眾運動中所出現的游擊戰這種新的戰術時，他認為這是當前歷史新的產物並且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把運動限於某一種固定的鬥爭形式。它承認各種各樣的鬥爭形式。”¹¹⁵ 當列寧主張馬克思主義不會拒絕任何鬥爭形式時，就同時為非正規的游擊戰創造正當存在的可能性，更進一步來看，在列寧的架構中，游擊戰或游擊隊員之所以具有正當性與正義性端視其與革命政黨的聯繫：



俄國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後幾乎不斷發生的游擊戰爭和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一定會有助於教會群眾在起義時採取正確的戰術。社會民主黨應當承認並且在自己的戰術中採取這種群眾性的恐怖行動，當然要加以組織，加以監督，使它服從工人運動和總的革命鬥爭的利益和條件，要毫不留情地消滅和剷除敗壞這種游擊戰爭的“遊民”行為。¹¹⁶

對於列寧而言，不是民族或國家，而是政黨的革命理想解決了游擊隊員的地位問題，只有不受黨中央控制的游擊隊員才是無政府主義者與人類的敵人，革命政黨的游擊隊員不僅是戰場上的戰士，他們更是社會的改革者（social reformers），他們追求的不僅是一場戰役的勝利，更是整體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改造，¹¹⁷他們具有強烈的責任感，亦即，一種“政治品格”（politischen Charakter）。施米特認為正是政治品格使游擊隊員能夠與一般戰士、強盜或罪犯這些人的行為從根本上區分開來：

游擊隊員戰鬥在政治戰線（politischen Front），正是其行為和政治品格表達出*Partisan*這個詞的原初涵義。因為，這個詞來自*Partei*（政黨），表達了與一個以某種方式作戰、打仗或從事政治活動的政黨或群體的關係。這類關係在革命年代變得特別有力。¹¹⁸

正是在革命戰爭的年代，革命政黨與其成員密切地整合在一起，施米特就強調：“當今真正的、幾乎唯一的完全組織（totalitäre Organisation）並非國家、而是革命政黨。”¹¹⁹所以，在游擊戰中我們可以看到基於革命信念的游擊隊員強大的戰鬥能力，他們會把敵人宣布為罪犯，並將敵人關於法、法規和名譽的一切概念視為意識形態的欺騙，游擊隊員根本不在正規性的法



律框架下戰鬥，他們蔑視和嘲笑正規性的戰爭框架，在處於絕對敵對性之下的革命黨員看來，依照傳統歐洲公法的規則下所進行的正規戰爭宛如一場“遊戲”一般。¹²⁰ 列寧可以說透過“政黨”（無產階級專政）使得“真正的敵人”上升到“絕對的敵人”：

克勞塞維茲曾談到絕對的戰爭，但始終還是以現存國家事務的正規性為前提。他可以將國家看成一個政黨的工具，卻根本無法想像一個向國家發號施令的政黨。隨著政黨被置於絕對地位，游擊隊員也成了絕對的，上升為一種絕對的敵對性的擔綱者。¹²¹

毛澤東是當代革命戰爭最重要的實踐者，他從1927年以來便累積了共產黨的行動經驗，1934年11月展開的“長征”，跋涉了一萬兩千多公里，損失慘重，從華南直抵蒙古邊界，累積了一系列游擊戰戰績和游擊隊經驗，其所造成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組合成為一個以游擊隊員為核心的農民與士兵政黨”¹²²。這一點正是毛澤東與列寧之間的不同之處，列寧只有把農民看作是工人階級的盟友，但是，毛澤東卻改變了共產黨在第三世界的戰略，把農民作為共產主義革命的突擊主力，列為當然的無產階級¹²³，他把中國的共產革命與農業革命合而為一。¹²⁴ 而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則為中國共產革命帶來了關鍵轉折，在戰爭期間毛澤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口號，使他得以從農民的動員轉而足以號召統一各階層中國人民，對他而言，“戰爭不僅是摧毀合法秩序以及消滅權力工具的手段，而且主要被視為動員廣大群眾的途徑。”¹²⁵ 革命不再是因戰爭和軍事失敗而爆發或促成，革命本身就是戰爭中的一部分。隨著1932年日本入侵中國，毛澤東系統地發展出既是民族的也是國際的內戰的所有現代方法，他使中國戰場上的游擊戰勝利達到一種前所未有且全面性的程度。



在1938年《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強調中國的游擊戰屬於“戰略”問題（克勞塞維茲和列寧只將游擊戰視為戰鬥的手段之一），而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大規模持久的游擊戰，在人類戰爭史中是一件嶄新且進步的事：

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發生的：中國既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但是這個大而弱的國家卻處於進步的時代，全部問題就從這裡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佔地甚廣的情況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佔地甚廣，但他們的國家是小國，兵力不足，在佔領區留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且由於中國的進步，就是說有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存在，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等等一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¹²⁶

施米特將毛澤東與列寧的游擊隊理論加以對照，他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中存在著一個具體的因素，使他比列寧更為接近事物最深層的內核，亦即，“毛澤東的革命比列寧更根植於本土（tellurischer fundiert）”¹²⁷。施米特引用了費舍爾（R. Fischer）的話說：“從全國範圍來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是少數，‘其領導多是由流亡者組合而成的理論家’；至1949年，以規模浩大的游擊戰為基礎，毛澤東及其戰友們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與本國的敵人國民黨戰鬥了二十年之久。”¹²⁸ 列寧的俄國革命是在莫斯科這樣的大城市，而毛澤東在革命草創階段就已經上了井岡山，中國共產黨人在其國土上



與人民產生更為深刻的關係。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徹底展現了游擊隊員“**依托鄉土的品格**”（tellurischer Charakter），毛澤東所進行的革命戰爭是一場“**本土的游擊戰**”（autochthonen Partisanenkampf），透過底層農民的動員他把整個傳統中國由上而下的皇權社會徹底掀了起來。他在1936年《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於如何研究戰爭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裡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¹²⁹

從抵抗拿破崙的西班牙游擊戰開始，1812年的俄國游擊戰、1813年普魯士王室所發布的時效短暫的戰時總動員令，它們都是為了保衛鄉土，零散的起義和游擊活動展現出強大的民族情感。在這點上，施米特特別注意到將游擊戰與哲學發展系譜之間的聯繫，他指出在1913年的柏林有著一種散發自普魯士智識界的巨大精神潛力，亦即，當時柏林的智識階層都是深富民族主義教養的人，“在這樣一個激盪的民族情感與哲學教養融合的氣氛中，游擊隊員的意義得到哲學上的揭示，游擊隊的存在獲得了歷史處境。”¹³⁰ 克勞塞維茲曾在1809年時讀到費希特討論馬基維利的文章，讀後他大受感動因而寫了一封信給費希特表達他的敬意，“信中表明，一種戰爭學說也加盟了（民族情感與哲學教養



的)融合過程”¹³¹。所以，在游擊隊員的政治品格中含帶著一種強烈地對鄉土的摯愛，他們是為了“防禦”家園而不是要去“進攻”。這股思想的星火從西班牙燃燒到柏林，再從柏林到俄國，最後在毛澤東的中國革命中開花結果：

1808年從西班牙飛到北方的這顆星火，在柏林才具有了理論形式，從而可能保持其烈焰，並傳遞到另一些人手裡。……在自由之戰後，黑格爾哲學主宰著普魯士，並試圖從體系上調和革命與傳統。黑格爾哲學因此可能被看作是保守的……不過，黑格爾哲學也保存了革命星火，並通過其歷史哲學為繼續前進的革命提供了危險的思想武器——比雅各賓黨人手中的盧梭哲學更危險。這件歷史哲學武器落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然而，這兩個德國革命家更是思想家，而非革命戰爭的積極份子。通過一位俄國的職業革命家列寧，作為教養的馬克思主義才形成了它今天展示出的歷史力量。¹³²

毛澤東所依托的鄉土是**第三世界**的中國，一個落後、苦難、封建的中國。在列寧的革命戰爭中，他從階級鬥爭中辨識出資產階級作為絕對的敵人，他是在階級這條唯一的戰線（single front）作戰著。相較而言，毛澤東的游擊戰凸顯了第三世界國家要在多重的戰線（multiple fronts）上作戰的命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相較於「民族國家與總體戰」的命題，「游擊戰與第三世界革命」也是凸顯出這一層的理論意義，前者以「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思考為基礎，指出了以民族國家之間鬥爭作為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戰線，而後者卻深刻地聯繫著第三世界的發展問題，亦即，一種屈從與欲求獨立自主的困境。施米特在經由對毛澤東的討論，指出了上述“多重戰線”的理論意義：



在毛澤東的具體處境中，各種類型的敵對關係交匯在一起，上升為一種絕對的敵對關係。與白人殖民剝削者的種族性敵對關係、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敵對關係、與同一人種的日本入侵者的敵對關係、在長期激烈內戰中日益增長的與自己民族弟兄的敵對關係並沒有相互抵銷或者制約，而是在具體情況下得到證實和加劇。¹³³

游擊隊員從歐洲到俄國，從俄國再到中國，最後再從中國擴散到整個第三世界，整個游擊隊理論從克勞塞維茲經列寧到毛澤東，是通過正規與非正規職業軍官和職業革命家的辯證法向前推進的。在此，我們嘗試從底下三個命題來表達游擊隊理論演進中（克勞塞維茲—列寧—毛澤東）所內含的核心意義：

“游擊隊非正規地作戰著”（克勞塞維茲）

“游擊隊非正規地在政治戰線上作戰著”（列寧）

“游擊隊非正規地在多重的政治戰線上作戰著”（毛澤東）

施米特認為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是一種新克勞塞維茲的戰爭學說，他認為毛澤東為“戰爭”這個概念提供了一個簡潔有力的思想基礎：「戰爭的意義正是在於敵對性。」¹³⁴（Der Krieg hat seinen Sinn in der Feindschaft.）從施米特所提出的這個命題出發，有兩個理論方向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認為毛澤東對“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此一命題的思考超越了列寧與克勞塞維茲，對毛澤東而言“戰爭就是政治”¹³⁵，他曾對黨員說過：“一句話，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¹³⁶所以，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政治就始終要包含著敵對性，和平也只是敵對性的一種表現形式。毛澤東的思考似乎呼應著施米特在1932年所發表的《政治



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一書中，所提出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命題：“所有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朋友和敵人的劃分。”¹³⁷對於施米特而言，所謂政治就是區分敵友，不過，我們認為史密特透過游擊隊理論的檢討，使他對於政治概念的檢討在理論上獲得更大的徹底性，戰爭與敵人的理論可以說在游擊隊理論中達到顛峰。¹³⁸在1932年的討論中，施米特還附著在對於“國家”的討論：“國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為前提。”¹³⁹基本上，施米特就是從國家與政治的聯繫基礎上來開展“敵對性”的討論，可是在對游擊隊理論檢討過後，他使得政治的敵對性理論獲得更大的普遍性。因為，非正規的游擊戰戰鬥根本不在正規性（國家之間）的框架之下來進行，“置身於這一限制之外，甚至已經成了游擊隊的本質和實存”¹⁴⁰。如此反而形成了更大的敵對性、更為強烈的政治意義：

我們必須密切注意的是，在這裡，政治概念的發展實現了一次徹底轉變。於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定型的古典的政治概念，是在歐洲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使古典國際法意義上的戰爭成為受國際法限制的純國家間的戰爭。自二世紀以來，這種國家間的戰爭及其所受的限制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黨派之間的戰爭(revolutionären Parteien-Krieg)。¹⁴¹

所以，在1963年為《政治的概念》寫再版序言時（《游擊隊理論》也在該年發表），施米特就有感而發地說道：“新的、具有時代特徵的戰爭類型和方法，迫使我們反思敵對性現象。……在這樣一個時代，怎麼可能停止對劃分敵友的反思呢？”¹⁴²



五 結語

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嘗試整理出一種屬於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的知識系譜，不是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葛蘭西、阿圖塞等人），而是列寧、毛澤東這些職業革命家與建國者成為了馬克思、恩格斯戰爭理論的重要繼承者。或許在他們的眼中，革命並非純粹是一場理論言辭的爭辯（例如：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矛盾、唯物分析中政治與文化的相對自主性），二世紀革命的實踐力量更不是只存在於歐美發達國家的街頭。基於敏銳的政治本能，他們試圖在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或者第三世界的鄉村與叢林中來尋找、創造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力量。

此處，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地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對於當下的思考意義是什麼呢？在九十年代柏林圍牆的倒塌、冷戰體系的瓦解，一個意識型態終結與新自由主義市場力量全面勝利的時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實踐都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許多左翼學者紛紛希望能為廿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例如，有學者（Hardt 和 Negri）就結合了後現代的思維而提出“帝國”的思考，試圖以“multitude”來替代傳統的“無產階級”來作為回應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革命主體。更有趣地是，也有其他左翼的學者（如：Chantal Mouffe）回過頭去結合了右派的思想資源（特別是 Carl Schmitt），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我們認為，除了上述的兩條路線之外，馬克思主義對戰爭的思考或許是一個值得嘗試的理論方向。目前許多相關的全球化理論思考都是帶有「偏見的」，因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關注於第一世界的發展問題（歐盟或美國）。相較而言，在當前全球化的學術論辯中，第三世界仍是缺乏理論位置或思考途徑的。



正如同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全球化過程裡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911的恐怖攻擊呢？（從美國的角度？還是第三世界的角度？）馬克思主義的游擊戰的研究或許會是一個有助於我們面對此一知識生產困境的方式。我們試圖從既有的游擊隊理論來提出一些未來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特別是針對“非正規性”和“依托鄉土”這兩個理論思考角度。首先，我們可以從“正規／非正規”這組差異性來出發。當美國將911世貿大樓的攻擊宣稱為“恐怖”行動而非犯罪行動時，似乎也就同時確立了賓拉登和蓋達組織游擊行動的“正當性”。游擊行動之所以恐怖正是在於其非正規性，游擊隊員從不採用正規作戰的方法，更不用說要去遵守國際法的規範框架；從游擊隊員的角度來說，游擊戰就是要“打了就跑”（hit and run）、“令人驚訝”（surprise）。不過，在當前全球化的秩序中，正規／非正規的區分遭遇到了一些難題。在前面所檢討的游擊隊理論中，正規／非正規的區分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簡單地說，游擊隊的非正規性依附於民族國家的正規性，在邏輯上，非正規性是透過正規性來加以辨識和確認的。如果從游擊隊非正規性的角度來看，辨識正規性最關鍵之處就是要去確認誰是真正的敵人（real enemy），施米特就認為游擊隊要認識自己就要認清敵人的形象：

敵人是我們自己的作為形象的問題。如果自己的形象是確定的，哪來的敵人呢？敵人並不是某種出於某一理由必須排除和因其非價值而必須消滅的東西。敵人處於我自己的層面。基於這一理由，為了要爭得自己的範圍、界線、形象，我必須以鬥爭方式與敵人清楚區別開來。¹⁴³

然而，當前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不斷地鬆動了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思想典範。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全球化的時代中，



民族國家已不再能作為理解正規性的基礎，連帶地我們又要如何去確認當前游擊戰的非正規性呢？同樣地，誰又是當前全球“恐怖主義”的真正敵人呢？美國霸權嗎？還是超乎民族國家體系之外的帝國秩序？還是全球資本主義呢？這樣的一個提問也關連到游擊隊“依托鄉土”而戰的問題。游擊隊員保衛著一塊其懷有鄉土之情的土地，所以，儘管他們在戰術上充滿靈活性、積動性，但是，他們卻永遠處於“守勢”，他們並非在進攻而是在保衛鄉土，為反抗佔領者而戰。此外，保衛鄉土是游擊隊員政治品格的重要基礎，這樣的政治品格使得他們不會被視為罪犯，並且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然而，當代的“恐怖”游擊行動似乎離開了鄉土，中東的游擊鬥士卻在西方國家之中行動，這意味著什麼呢？他們反抗的是哪種佔領者呢？什麼是全球化時代中的敵人形象呢？這種種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未來進一步加以深入探究的。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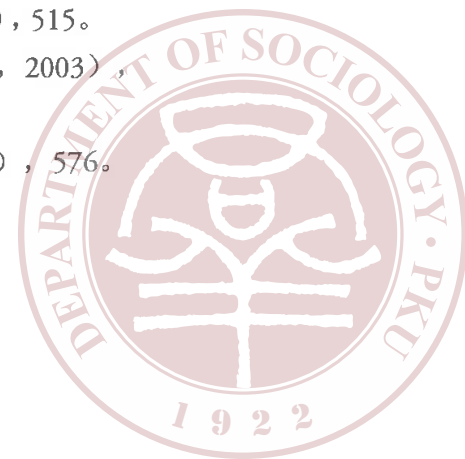
- 1 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吳叡人譯（台北：時報，1999），7。
- 2 在1850年代初期，歐陸的革命運動陷入低潮，馬克思與恩格斯已經無法公開正面地闡述他們的革命理論，〈紐約每日論壇報〉算是暫時提供了一個讓他們影響社會輿論的機會。
- 3 洪鍊德，《馬克思》（台北：東大，1997），136。
- 4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所寫的條目（共計67條），收錄在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中（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64））。恩格斯所寫的條目可以說包括了軍事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了軍隊的形成、組織和裝備、補充和訓練、指揮管理等問題，戰略和戰術，地面部隊各兵種（步兵、騎兵）和海軍的組織和戰術，築城工事和後勤供給，部隊的宿營等問題。此外，他還十分關注軍事技術技術的問題，寫下了許多關於武器的條目（刺刀、明火槍、馬槍、卡倫砲等等）以及重要的武器發明（火藥的發明、砲兵學和軍事工程學的進步、蒸汽機在海軍的使用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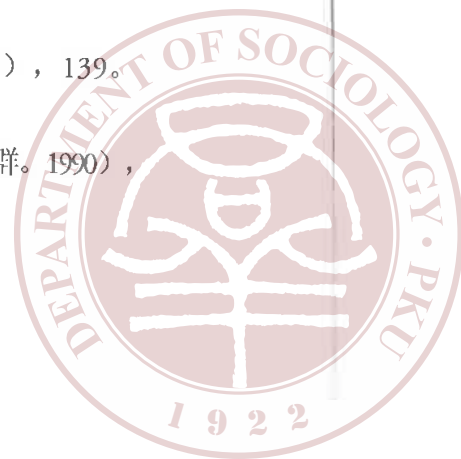
- 5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只是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小間斷，到了1860年代又重新以更大的規模成長，也使得政治上的革命難以獲得動力。
- 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543-5。
- 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72），244。馬克思在稍後（1月11日）的回信中就說：“我多少翻閱了一下克勞塞維茲的書，這個人具有近乎機智的健全推斷能力。”同上注，248。
- 8 同上注，562。
- 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509。
- 10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49。
- 1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9。
- 12 同上注，27。
- 13 同上注，29。
- 1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512。
- 15 同上注，510。
- 1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二版）（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118-9。
- 17 Neumann, Sigmund and Mark von Hagen, “Engles and Marx on Revolution, War, and the Army in Society.”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4.
- 18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二版），239。
- 1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二版）（北京：中央編譯局，1998），655。
- 20 霍布斯邦，《資本的年代》，張曉華等譯（台北：麥田，1997），110。
- 21 同上注，101。
- 2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62），703。
- 23 在義大利和德意志邁向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除了法、義、澳之間的這場戰爭之外，還歷經了四場大戰：普魯士和奧地利對丹麥的戰爭（1864）、普魯士和義大利對奧地利的戰爭（1866）、普法戰爭（1870-1871）。
- 2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62），297。



- 25 同上注，252。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26 同上注，262。
- 27 同上注，253。
- 28 同上注，250-1。
- 29 同上注，281。
- 30 同上注，298。
- 3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二版），118-9。
- 3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710。
- 33 霍布斯邦，《資本的年代》，13。
- 34 哈德、納格利，《帝國》，韋本、李尚遠譯（台北：商周，2002），133。
- 35 限於篇幅與主題，筆者無法詳細處理哈德和納格利的相關論點，請參閱拙著〈戰爭與全球化：邁向“永久和平”？或恆久的“全球內戰”〉，《思與言》第46卷2期（2008）：35-86。
- 36 列寧，《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110。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在民族問題上猶豫不決的第二國際頓時全盤瓦解，也使馬克思主義內部開始出現一些重要變化。相關討論可以參閱陳宜中，〈從列寧到馬克思：論馬克思的共產思想及其與列寧的關聯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2期（2002）：6。
- 37 Heilinger，〈帝國主義理論的歷史（至1945年）〉，張世鵬譯，收於張世鵬（編），《全球化與美國霸權》（北京：北京大學，2004），19。
- 38 從十九世紀90年代起，社會民主黨內開始了一場關於帝國主義的辯論，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這也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這場辯論主要是在德國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新時代》和《鬥爭》這兩份機關刊物進行的，參加的人物包括了Karl Kautsky、Edward Bernstein、Rudolf Hilferding、Rosa Luxemburg、Otto Beumer等人。同上注，21。
- 39 盧卡奇，《列寧：關於列寧統一性思想的研究》，張翼星譯（台北：遠流，1991），57。相關論點亦可參閱Lane, *Leninism: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40 列寧，《列寧全集》（第60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0）。
- 41 列寧，《列寧全集》（第30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515。
- 42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上海人民，2003），411。
- 43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576。
- 44 同上注，577-578。



- 45 同上注，511。
- 46 同上注，660。
- 47 同上注，650。
- 48 同上注，649。
- 49 同上注，655。
- 50 同上注，658。
- 51 同上注，679。
- 52 同上注，680。
- 53 盧卡奇，《列寧：關於列寧統一性思想的研究》，66。
- 54 Martin Shaw 就已注意到，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的序言中就將“壟斷資本主義”設定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state-monopoly capitalism)，“民族國家”已是一個重要的思考形式。請參閱 Shaw Martin, “War, Imperialism and the State System: a Critique of Orthodox Marxism for the 1980s.” In Martin Shaw (ed.), *War, State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55。此外，除了俄國本身的狀況（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列寧也權衡了當時歐洲本身的局勢，例如：挪威從瑞典的脫離、波蘭對德國的抵抗，而提出民族自決。
- 55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682。
- 56 同上注，564。
- 57 同上注，571。
- 58 同上注，396。
- 59 同上注，565。
- 60 同上注，524。
- 61 俄國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後，就宣佈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也達成了當初將列寧從瑞士送回俄國的戰略意圖），其後正是俄國內戰的爆發。
- 62 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王章輝等譯（台北：麥田，1997），98。
- 63 Palliccia A., “Clausewitz and Soviet Politico-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Review*, 56(8)(1976), 28.
- 64 列寧，《列寧選集》（第3卷），109–110。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65 Bolsinger, Eckard, *The Autonomy of the Political: Carl Schmitt's and Lenin's Political Realis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59–60.
- 66 列寧，《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139。
- 67 同上注，139。
- 68 列斐伏爾，《從黑格爾到毛澤東——國家理論》（台北：結構群，1990），190。



- 6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二版）（北京：中央編譯局，1995），170。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70 列寧，《列寧選集》（第3卷），119。
- 7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94。
- 72 同上注，675。
- 7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630-1。
- 74 列寧，《列寧選集》（第3卷），123。
- 75 列寧，《列寧選集》（第2卷），124。
- 76 同上注，124。
- 77 同上注，127-8。
- 78 列斐伏爾，《從黑格爾到毛澤東——國家理論》，160。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7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14。
- 80 列寧，《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85），149。
- 8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84。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82 同上注，249。
- 83 列寧，《列寧選集》（第3卷），142。
- 8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99。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8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76。
- 8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24。
- 87 同上注，55。
- 88 同上注，58-9。
- 89 同上注，324-5。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90 同上注，227。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91 列寧，《列寧全集》（第28卷）（北京：中央編譯局，1985），173。
- 92 李德哈特，《戰略論：間接路線》，鈕先鍾譯（台北：麥田，1996），458。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52。從字義與字源上來看，“guerrilla”（游擊隊員）這個詞根源於西班牙文的“guerra”，就是指小戰、小規模的戰爭，該詞本來指西班牙反抗法國佔領軍的人民武裝起義，後來泛指一切偷襲、破壞有組織的武裝行動的非正規戰爭。
- 93 李德哈特，《戰略論：間接路線》，458。
- 94 霍布斯邦，《極端的年代》（上、下），鄭明萱譯（台北：麥田，1996），650。



- 95 “游擊隊員”一詞可以英譯為“guerrillas”、“partisan”，而“partisan”源於法文，從十六世紀以來就有這種稱謂，法文詞又源於義大利文，意指黨人、幫夥、追隨者，狹義指在被佔領區反抗入侵者的志願軍、義勇軍戰士。施米特在書中對該詞的解釋是：“Partisan在德語裡稱為Parteigänger，及一個政黨的同黨，但其具體涵義因時而異，不僅在一個人與之同黨的政黨或陣線方面，而且也在其同行、同黨、並肩戰鬥以及有時甚至一同被俘方面。有交戰各方，也有訴訟各方、議會民主制的各黨派、意見和行動的各派等。在羅馬語族中，Partisan這個詞可用作名詞和形容詞；在法語中，人們甚至可以說持某種意見的一方。簡而言之，這個詞從一般的多義詞突然變成了政治性的詞。”（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61。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96 同上注，357。
- 97 同上注，392。
- 98 同上注，355。
- 99 同上注，352。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00 同上注，352。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01 同上注，431。
- 102 此處需要稍微說明的是，對施米特而言，拿破崙絕對戰爭的形式本身也威脅到了傳統歐洲公法的法律框架，直到1914至1915年的維也納會議才由復辟的勢力加以恢復。（同上注，355）
- 103 同上注，356。
- 104 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第1-3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北京：商務，2003），671。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05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61。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06 同上注，354。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07 馬克思主義討論游擊戰的理論系譜可以追溯馬克思1854年所寫的〈革命的西班牙〉以及恩格斯1857年所寫的〈山地戰今昔〉這兩篇文章，其中分別討論了西班牙游擊隊與印度起義的問題，在恩格斯的文章中還進一步發展了關於人民游擊戰的原理，他認為這種戰爭是旨在反對外國奴役者的廣泛全民運動所特有的戰爭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二版）（北京：中央編譯，1998），501-573。
- 108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93。
- 109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685。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10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94。
- 111 同上注，395。



- 112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695，697。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13 同上注，681-2。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14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95。
- 115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688。
- 116 同上注，686。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17 Che Guevara在《游擊戰》一書中就強調游擊戰不僅是純粹的戰鬥手段，它更是一種社會改革的嘗試。Che Guevara, Ernesto, *Guerrilla Warfar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8), 38-41。
- 118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60。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19 同上注，360。
- 120 同上注，394。
- 121 同上注，435。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22 同上注，398。
- 123 阿諾德，《共黨「革命」戰爭》，游崇鼎譯（台北：黎明文化，1976），110。
- 124 毛澤東對農民在中國共產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涉及到了共產主義早期在中國發展的路線爭議，一方是在上海的共產黨由蘇俄大使館掩護下進行秘密活動，企圖恢復對工人的影響力，而另一方則是在江西與福建省有廣大統治區域的共產黨，裡頭有毛澤東的游擊隊，從戰爭的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都市陣地戰和鄉村游擊戰的差異。在1935年之後毛澤東才在黨內領導權的鬥爭取得勝利。
- 125 阿諾德，《共黨「革命」戰爭》，112。
- 12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北京：人民，1991），405。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27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99。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28 同上注，399。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 12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北京：人民，1991），170-1。
- 130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389。
- 131 同上注，389。
- 132 同上注，391-2。
- 133 同上注，400。
- 134 同上注，400。
- 13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481。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136 同上注，545。黑體為筆者所強調。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之後，學界熱烈地討論著「後共產主義轉型」的問題。相較於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紛紛瓦解，然而，中國和古巴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仍能繼續維持共黨專政的體制，許多討論會從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角度來加以解釋，不過，筆者認為，相較於東歐的共產政權強烈地依附於長期蘇聯的扶植，中國和古巴的政權從一開始就是透過自主的戰鬥來建立的。

137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138。

138 同上注，354。

139 同上注，129。

140 同上注，356。

141 同上注，356。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142 同上注，124-5。

143 同上注，429

